

李

LI

零

LING

自

李 零 著

跨

世

选

纪

学

人

文

存

集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跨世纪学人文存

李零

自选集

李零 著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Z427.5

1999. 8. 31
购自作者处

跨世纪学人文存
李零自选集
李 零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89×1194 1/24 印张：14 插页：2 字数：307千字

1998年2月第二版

199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501—4000册

ISBN 7-5633-2507-7/K·094

定价：(精)34.00元

丛 书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元化	王铁崖	张岱年	张政烺
李学勤	陈岱孙	周一良	季羨林
费孝通			

出版说明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

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的踟蹰，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90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倘不能对自身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崩溃的开始。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国这一批新学人，多是这样的“心忧”之人，当其激切之初，曾蹈厉

于良知的煎迫；当其冷静之余，又沉潜于学理的涵泳。这样的“心忧”，是学界的好传统，也是中国学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他们的学术自选集、也许不一定能呈示其学术全貌，但肯定能够突出体现其宝贵的学术品质。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希望这样的品质能够在 21 世纪的中国学人身上传承下去。

“跨世纪”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并不是说未被列入“跨世纪”的人就无权迈进下世纪的门槛。“跨世纪”只是意味着，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昌明与辉煌有着多么热切的期许，以及基于这热切期许而履行的对中国文化建设重任的自觉的肩负。没有这样的自觉，便没有迎接新世纪的真正准备，也就没有了开创未来的现实基础。丛书收入的，都是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著述，我们想：人类存在的价值，其终极尤须以人文的尺度来衡估。

90 年代的沉潜，也许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已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样的转型是承前、也是启后。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出版这套“跨世纪学人文存”，旨在尽我们的薄力，倡学术之昌明。

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九七年九月

自序

我国学术界向有重文轻书之风(与西方学术界相反),特别是在受考据学影响至深的古史学界尤其是如此。在我们这一行里,很多学者都认为只有短札笔记式的东西才算“真学问”,书反而是写给外行看的“小儿科”。有些大牌学者甚至一辈子都不写书,只等他的门人给他编集子(更何况有些腹笥深厚的学者就连文章都不屑为,宁可把学问烂在肚子里);即使写书,也只有拼合笔记成资料长编式的笺注疏释,才算是具有“大家风范”。所以不但论文的地位高,而且论文集的地位尤高,有时简直就是一种“特权待遇”。就我所知,至少几年前,冠以个人之名的论文集还只是泰斗型人物才能享有;次一级的人物往往只配用专题作论文集的书名,而把人名标在下面。一个学者要想熬到这份儿,那往往都得“胡子一大把”、“桃李满天下”。

对论文和书,我的看法倒不是这样。我认为国内的常见书,特别是那种集体编写,四平八稳,由许多格式相同的小“豆腐块”组成的书,固然很多是“片儿汤”,但作为学术成果,更能体现作者功力的还应当是书。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有书才能为读者提供“知识面”和“思想整体”,让他们知来知去,便于交流,也便于教学。论文吗,恐怕还是把它当作一种有如报章追逐新闻,更具灵活反应特点的东西,或者作为出书准备的“初级产品”更好。但是说实话,要想把论文提炼成书往往是很困难的事情,它在语言和思想上的要求都比写作单篇论文要高得多。如果作者没

有精力或能力把自己的论文整合成书,或者受不了新材料的诱惑,更热衷于—往无前的跟踪追击,论文集当然也是很不错的东西。在我看来,一部好的论文集应当是介于“书”、“文”之间,既能保存“文”的生猛鲜嫩(当然也就不免于粗糙),又粗具“书”的轮廓外貌(构成向后者的过渡)。而自选集和别人编的集子不同,则应当更能反映作者的探索过程和研究思路(而不是一种面面俱到的“什锦拼盘”)。

这本自选集是我从1979—1997年这18年里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出(参看书后所附的主要著述一览表),内容涉及面很广,显得有点杂,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围绕着一个“古”字,而且是聚焦于中国学者所谓的“先秦两汉”,西方学者所谓的“Early China”。在我看来,任何学者要想在这一领域真正做出成绩,“单打一”都是不行的,但“四面出击”(兼顾历史、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又有学力精力不逮之虞,其实驾钝如我,本没有什么好办法。勉强去做,只是不得已。我既没有奢望作一个“通人”,也没有刻意作一个“专家”,宏观的讨论或细节的考证,都只是随着兴趣跑。

现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曾换过好几个单位改过好几次行,因此所受训练不只一种。这确实给我后来的研究带来很多好处,但坏处则是容易分散精力,难免草率粗疏。我的不断转换战线并不是出于我个人的设计安排,乃是由经历而造成。首先,我能迷上中国古代,这本身就是偶然的。中学时代(1961—1967年),我是因为爱好书法篆刻才死啃《说文解字》,因为想写漂亮文章才醉心诗词古文,这是我和古文字、古文献结缘的开始。那时我不爱上课,只爱乱读闲书,最爱看的先秦文献是《诗经》、《老子》和《孙子》。中学毕业后,我在内蒙、山西插过7年队(1968—1975年)。这段时间往往被人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但我却庆幸自己可以借此摆脱讨厌的考试,继续读我的闲书。所谓“失学”只是失去正规教育,路子比较野而已。比如我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就是在这一时期下的功夫,我的文献学基础,特别是版本目录和校勘学知识,也是在返城期间从首都图书馆泡出来的。1976年,我回到北京,一心想到文物考古部门工作,希望哪怕有个旁观的机会也行。而天不负我,次年,我以研究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文投谒夏鼐先生,终于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分在资料室整理金文资料(为后来的《殷周金文集成》核对著录和准备拓片),开始接触古文字研究和考古学研究,业余时间继续研究《孙子兵法》。那时我最大的收获是打下了古文字研究、特别是金文研究和战国文字研究的基础。1979年,我开始在《考古学报》、《考古》和《文史》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两篇是研究青铜器铭文,一篇是研究《孙子兵法》)。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在张政烺先生指导下研究商周青铜器,选定题目是楚国铜器,由此开始注意楚国文字和楚国文化的研究。我关于下寺楚墓的讨论、关于楚国铜器的综合研究和写作《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一书都是在这一时期。1981年,作为田野实习,我参加了考古所在陕西西高泉春秋秦国墓地的发掘。1982年,我从研究生院毕业后,分回考古所,受人排挤,被迫中断原来参加的金文研究,改做田野工作,曾在陕西长安县沣西西周遗址进行发掘。这两次发掘经历对我也极为宝贵,它使我对真正的野外发掘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1983年,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终于逃离考古所,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所研究农业起源、植物栽培史和土地制度史,开始注意史学理论、古代社会史和制度史的研究。我所写的与这类问题有关的论文虽然多发表于后来,但酝酿却是在这一时期(当时写了不少草稿,也翻译了一些资料)。1985年,我调到北京大学,除在古文献研究所从事古文字研究,也在中文系讲授古文献课程。1989—1990年和1993年,我曾两次到美国作访问研究,从此与国外汉学界有了较多接触,开始在国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共四篇)。近10年里,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1)青铜器和金文的研究;(2)战国文字和简帛书籍的研究;(3)古书体例和古书年代的研究;(4)《孙子兵法》和古代兵书的研究;(5)古代方术的研究;(6)先秦思想史的研究。这六个方面,(1)(2)(4)是继续过去的研究,(3)(5)(6)是后来开展。它们当中,目前只有(4)(5)两项已有成书发表,其他多是以论文的形式问世。如果说我的研究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往往交叉使用不同的研究手段,尽量利用已有的学术训练。

在现在的这个集子里,因为“选”就不可能“全”,我不但无法把我所写的文章悉数收入,而且就连各个方面也不可能都照顾到。第一,从道

理上讲,这个集子和我已经出版的书应避免重复,因此它不包括我所发表的所有与《孙子兵法》和古代兵书有关的论文,也不包括我所发表的所有与中国古代方术有关的论文。这些论文,前者几乎都已收入我新近出版的《孙子古本研究》一书;后者,大部分也已被改写,收入我新近出版的《中国方术考》一书,只有少数文章准备续写补充后,另编一书。第二,由于排印上的困难和读者面的狭窄,我有意把考古和古文字类的文章压到最低限度,只限可读性稍强,与历史文化有关的一组文章。因此书中保留的主要是四类文章,一类是讨论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即三篇一组的第一组文章。接下来的七篇文章则侧重于古代社会史,是第二类。再下来与考古和古文字有关,是第三类。最后三篇是讨论古代思想史,是第四类。

现在通观自己历年发表的文章,很明显,我的早期文章多带有学艺色彩,手脚比较拘谨,而近年则能稍稍放开,把以往的研究组织到较大的课题上去。在我的文章中,我一直模模糊糊想要做的事情主要是:

(1) 找到一种能够突破早期西方史学偏见的新视角和沟通“古今中外”的切入点(见本集的第一篇和最后一篇文章);

(2) 深刻反省“《古史辨》派”对中国史料的全面审查(见本集的第二、三篇文章);

(3) 把对中国古代制度史的研究组织到“礼坏乐崩”这个诸子争论背景的研究上去,并以此作为重新研究儒家学派的切入点(见本集的第二组文章和最后一篇文章,将来应另写新书);

(4) 重视中国古代实用文化,特别是向来作为子学附庸而被学者忽略的算术、方技之书和兵书的研究,以此作为切入点,从子学的外围向子学的内部进攻,一则借以探索道家和道教传统的源头,一则借以探索中国法家的行为学基础(见拙作《中国方术考》和我对中国古代兵书的研究,后者应另写新书);

(5) 以(3)(4)的研究为基础,重新估价先秦思想的格局(见本集最后一组文章)。

另外,作为我的本职工作,青铜器和古文字的研究工作,我也一直在进行(见本集的第三类文章)。

如果这本自选集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了解我的探索过程和研究思路,我就心满意足了。

1996年12月11日写于北京蓟门里

李 零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生于河北邢台，祖籍山西武乡。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从张政烺先生研究殷周铜器，毕业后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历史、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著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国方术考》和《孙子古本研究》等书。

选题策划

刘景琳

责任编辑

龙子仲 覃仕立

封面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 + 张朋

目 录

自序·····	(1)
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	(1)
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	(22)
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	(58)
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	(85)
西周金文中的职官系统·····	(112)
“车马”与“大车”(跋师同鼎)·····	(124)
包山楚简研究(文书类)·····	(131)
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	(148)
论秦田阡陌制度的复原及其形成线索·····	(169)
《商君书》中的土地人口政策与爵制·····	(184)
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草稿)·····	(195)
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 ·····	(213)
楚帛书的再认识·····	(227)
文字破译方法的历史思考·····	(263)
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	(273)
说“黄老”·····	(278)

道家与“帛书”.....	(291)
道家与中国古代的“现代化”.....	(299)
主要著述一览表.....	(312)

CONTENTS

Preface	(1)
Reflections on current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1)
A reconside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texts	(22)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Chinese myth and legend	(58)
Land ownership as reflected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85)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offices reflected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112)
“Horse-chariot” and “ox-wagon”, a note on the inscription of Shi Tong Ding	(124)
A study of the Baoshan Bamboo Slips; section on legal cases	(131)
Two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zation of residents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ir different origins	(148)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Qianmo land system in the Qin kingdom and the clue to its formation	(169)
The policy of land and population and the ranking system in <i>Shangjun shu</i>	(184)
The three bronze vessels of Pingshan and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the Zhongshan kingdom(original draft)	(195)
Paleographic evidence of the Chu royal line's origins	(213)
Reconsidering the Chu Silk Manuscripts	(227)
A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 of the method of deciphering	
Chinese graphs	(263)
Transcription of and commentary o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ird-script inscription of a proverb from a bronze belt-hook	(273)
On "Huang-Lao"thought	(278)
The Taoist school and excavated silk manuscripts	(291)
The Taoist school and the "arch-modernization" in early China	(299)
Author's publications	(312)